

第二章 理論分析與文獻探討

以中共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為意識形態的中國大陸，傳統的發展觀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片面追求經濟成長，忽視人文的、資源的、環境的指標，傳統的發展觀確實帶來經濟的迅速提升，卻反而引發了更多的經濟社會問題，隨著政經情勢的遞嬗又該如何調整？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才得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否真能扭轉漸趨惡化的經濟社會問題？

實際上，發展模式的轉化，並非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這個正確的發展思路雖早已提出，卻長期沒有做到。而以科學發展觀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首先是因為中國大陸改革發展已進入不得不進行調整的階段。和諧概念的核心體現了體制設計與發展模式之間的交互作用，其實質是均衡與協調，其政策意義是引導政府管理的方向和方式的有效轉化，其他有關和諧的具體內容的解釋都在此基礎上展開。同時，這一目標的提出也是轉軌進程發生階段性轉換的必然要求。這種要求體現了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能惠及中國大陸全民的良好發展模式。以下探討相關發展理論作為中國大陸發展模式轉化的參考依據。

第一節 理論分析

發展理論嚴格來說是產生於二次大戰以後，雖然發展時間較短，但是各學派林立，對人類發展影響深遠，主要包括有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及世界體系理論等，再加上此後相關發展理論學派的衍生，為全世界社會發展提供參考與借鑑。

壹、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

現代化學派發源地為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美國與西歐，研究主題為「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與文化變遷。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為首的結構功能學派，是現代化理論的先驅者，其研究單位是「個別國家」。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假設乃認定，發展是單向式的，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作為開發中國家的模

範，而其發展策略，則是引進外資技術、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其目標放在先追求經濟成長，並以經濟成長為發展動力，進而帶動各個方面的發展。「現代化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指現階段有計劃的變遷與結果。」⁴³

現代化理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所有社會的發展歷程都是相似的，都會經歷幾個共同的发展階段；二是歐美社會的發展道路已經展現了這些共同性階段，因而歐美現代化之路是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必經階段和最終目標。

在這兩個假設的基礎上，現代化理論對第三世界國家變革的判斷，從整體上可以概括為：(1)價值的轉變是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前提；(2)西方的工業化過程將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再現；(3)改變行為傳統模式的社會變遷，是在現代化的推力下發生的，這個推力與西方社會長期發展所憑藉的動力是一致的；(4)西方科技和觀念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同時也將伴隨著一系列階段和深刻的變化；(5)現代化過程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一體化的變遷過程，第三世界不發達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本身的社會結構系統有「缺陷」，因而經濟增長需要以改組其結構條件——文化和社會制度的阻礙為前提。簡言之，所有的現代化理論都相信：由於西方科技的傳播，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發達國家現有的一切特徵。⁴⁴

安德魯·韋伯斯特 (Andrew Webster) 歸納現代化理論的要點如下⁴⁵：

(1)現代化理論包含著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內容。例如，它談到價值體系，個人的進取心，資本積累等等。

(2)大多數理論都強調人們的價值觀、行為規範和信仰在決定社會類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價值觀的轉變是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3)西方工業發展的歷史不再被看成是韋伯當初認為那種只有在西方才能產生的現象，而是可以在全世界的發展中普遍見到的。正如

⁴³ 呂亞力等，《社會科學概論》，台北：台灣東華書局，1989年6版，頁190。

⁴⁴ 胡格韋爾特著，白樺、丁一凡譯，《發展社會學》，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⁴⁵ Andrew Webster 著，陳一筠譯，《發展社會學》，台北：久大文化、桂冠圖書，1990年8月，頁48-49。

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所說：「從歷史上看，現代化是一個朝著歐美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演變的過程，這一過程於十七至十九世紀就在歐美各國完成了。」

(4)改變傳統行為模式的社會變遷，是現代化的推力下發生的。儘管這種推力是在西方社會內逐漸形成的，但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可能從外面引入這種推力，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可以在發達國家的援助下邁入現代社會，而發達國家的思想觀點和技術也就可以輸入窮國並得到傳播。

(5)這種「靠傳播而現代化」(modernisation by diffusion)的過程應當鼓勵第三世界本身某種特徵的發展，包括以核心家庭為基礎的都市化，發展教育以掃除文盲和進行職業訓練，發展大眾媒介以傳播思想和進社會意識的發展，提高政治覺悟和民主制度的參與，通過提供投資而增加商業的機會，用理性立法代替建立在傳統的效忠觀念基礎上的權威模式等等。

(6)不同的社會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因為它們被視為現代之光照耀的程度不同，在輸入現代化特徵方面就有成功性大小之差。

現代化理論具有以下共同點：(一)堅持傳統與現代的極端二分法，認為社會發展就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二)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分析時：1.從發展階段上看，認為這些國家都處於傳統社會階段，必須突破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某個「臨界點」，才能啟動向現代社會的轉型；2.從發展原因上看，認為這些國家之所以未能實現現代化，是由於其社會內部的傳統性使社會缺乏進步的動力；3.從發展途徑上看，認為這些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要西方化或者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⁴⁶基此，「現代化理論」可以說是根據歐美先發、先進國家的經驗，以歐美學者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變動理論。根據現代化理論，歐美先進國家是根據本身的努力而創造出現代化的「內發型發展」模式；而許多非歐美後進國家是以先進國家為模範而進行現代化的「外發型發展」模式。⁴⁷

⁴⁶ 周運清，《新編發展社會學》，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頁19-20。

⁴⁷ 「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雖然有些國家是完完全全借用歐美發展模式的外發型發展；但適合地區的生態體系，根據社會構造、精神構造的傳統，依靠地域住民的創意，創造新的生產、流通組織以及新的衣、食、住方式的內發型發展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就是說，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外發型和內發型是可以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中同時並存的。

然而，現代化理論的缺陷在於它一種過於簡單的發展理論，它缺乏兩點基本內容：一是充分的歷史闡釋；二是足夠的結構分析。從歷史的角度說，它忽略了大量的歷史證據，這些證據說明，經濟成長過程不能簡單歸結為現代的價值觀念和制度去取代傳統的東西。從結構角度來說，現代化理論沒有揭示諸如引進技術或擴大市場這類經濟成長的因素，在發揮作用時如何受到現存社會關係的制約？並且，構成社會關係的社會權力與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在現代化理論中幾乎未提。⁴⁸也就是說，現代化理論雖然提出了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但是對於發展過程卻缺乏闡述。

但 20 世紀 60 年代末，現代化理論的核心觀念和許多觀點受到第三世界社會科學家和發達國家激進學者的猛烈抨擊。他們指責現代化理論關於「傳統」和「現代」的劃分過於簡單，無法詳述發展中國家的變遷過程。因此，發展出新的現代化理論，使得現代化理論更有說服力。

第一，不再把傳統與現代性看作是兩個內部始終如一的、均質的統一體，而是認為無論傳統還是現代性內部都包含著性質不同的要素；不再把傳統和現代性當作互不相容的對立兩極，而認為這兩者是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補充的；不再把傳統籠統地都視為是現代化過程的阻礙因素，而認為有許多傳統因素可以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第二，不再堅持「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不再把西方所走的現代化道路作為唯一的發展之路，這種發展模式可能在其他國家不適用，而是認為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發展路向和模式；與此相聯繫，它們不再滿足於現代化過程作抽象的描述和分析，而是更加注重具體的歷史比較研究。

第三，不再忽視外部環境因素在模塑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中所發揮的作用，而是期望將內、外因素結合起來，從兩者的相互作用中來考察現代化過程。⁴⁹這也就是現代化理論其中一派理論認為，

⁴⁸ Andrew Webster 著，陳一筠譯，《發展社會學》，台北：久大文化、桂冠圖書，1990 年 8 月，頁 55。

⁴⁹ 曹方俊，〈現代化理論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齊魯學刊》，2007 年第 5 期，頁 136-139。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將互相截長補短，最後趨於同一種社會形態，這就是所謂的「趨同論」或「聚合理論」(Convergence Theory)。他們認為兩種制度都在離開各自的極點位置，並且向中間靠攏，未來社會將趨同成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社會。⁵⁰然而，即便趨同已是一般的共識，但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依舊面臨強勁的考驗。

貳、依附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論的發展是由於現代化理論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與明顯的不足之處，如分析方法過於簡單和抽象化；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以及保守主義傾向等等，不能合理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許多發展中國家運用現代化理論所提供的「增長第一」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卻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使人們對現代化理論產生了懷疑和批評。⁵¹

依附理論學派發源地為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國家，其盛行時期為 1970 年代。依附理論否定現代化理論的講法，認為一個國家落後，源於發達國家對它的剝削。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下，依附理論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參酌，其主要重點在於藉由依附與發展的雙重性來提升經濟水準，企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方向。

古典的依附理論強調外部性的依附，其假設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的經濟不平等關係，邊陲國家的角色強烈受到外國利益者的干預，排除了其自主發展的可能性。也就是發展中國家係藉著高度依附跨國公司來發展其經濟，但亦由於此依附而產生低度發展之困境。這些發展中國家，雖然他們依附於西方國家而得到發展，但在這種發展中，往往是西方國家受益，第三世界國家受害。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發達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Frank, 1967; Dos Santos, 1971; Amin, 1976)。

⁵⁰ 樊期曾主編，《現代科技革命與未來社會－評兩種社會制度「趨同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頁1。

⁵¹ 徐新，《發展社會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316。

因此，依附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富國把他們的財富剝削走了。當代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狀態是由西方國家造成的。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擴張干擾和阻礙了另一些國家內部的社會進化，使它們陷於不發達狀態。激進的依附論者把消滅依附性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⁵²這或許可以解釋中共一直極力強調反對任何外國勢力以任何形式干預內部事務的理由。

研究發現拉丁美洲國家不同於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主要是體現在其發展步伐在實踐上落後先進國家甚多，經濟成長卻高度仰賴於初級產品的出口，因而特別不利於市場條件的改變與提昇。(周志杰譯，2003：105) 因此成也「依附」、敗也「依附」，如何甩開依附的窠臼成為「依附理論」學者研究的課題。

根據依附理論，對依附國家的發展大致建立了兩個主要的假定 (Berrett and Whyte, 1982：1064-1089)：(1)、依附會造成經濟成長的緩慢。一個國家對外來的投資和援助，依附程度愈高，則它的經濟成長愈緩慢。(2)、依附會造成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平均。如果外資外援愈多，這個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就會愈不平均。⁵³

依附理論的最大弱點，是對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判斷的失誤。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個國家的經濟都是相互依附的。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越大，對國際經濟的依附性就越大。把依附性與不發達聯繫在一起顯然是不合適的。依附理論誇大了當今第三世界國家對於工業發達國家的依附性，片面地把不發達的根源通通歸諸於外部原因，認為取得發展的關鍵問題是減少依附性或斷然結束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依附。儘管依附理論中存在著不同的流派，有的主張徹底同資本主義脫鉤，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有的主張逐步爭取經濟獨立，減少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依附，但他們立論的基礎都是依附性導致不發達，依附對發展中國家弊大於利。⁵⁴

雖然依附理論點出了拉丁美洲國家發展的徵結，但也引申出一些解釋的問題，就是依附理論過分強調世界經濟市場對於邊陲國家發展

⁵² 王義祥，《發展社會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127。

⁵³ 葛永光，《意識形態與發展：中山思想與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幼獅文化，2005年，頁49。

⁵⁴ 王義祥，《發展社會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138。

的制約影響，而忽略了對其政治因素運作的考量，只是強調外部帝國主義對邊陲殖民地之決定論。如台灣與南韓的發展經驗就無法依此充分解釋。另外，依附發展理論是依附理論的變種，它主張跨國資本能在發展中的內需市場上牟利，所以邊陲也能得到部份的發展，但是這往往是以腐敗或社會兩極分化為代價的。

由於依附理論無法充分解釋東亞經濟發展現象，於是乎在70年代末期，學者 Cardoso 與 Faletto，對依附理論作了修正，進而提出依附發展理論。這觀點認同「依附」和「發展」並不是對立的看法，依附的動力形式可以用來解釋經濟之發展，它不再強調依附的結果是低度發展的唯一趨勢走向，依附發展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形式。再來的是，依附發展理論放棄了其偏狹之依附的結構決定論邏輯中，而視依附為一開放之發展過程，可能傾向於發展，亦可能造成低度發展。

依附發展理論指出，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機器為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一方面創造了優良的投資環境，例如降低稅率、允許資本回流、發展基礎建設；另一方面壓制工會和社會運動，使得工資降低，而造就了依附發展國家的國家機器為威權主義的統治型態。這樣的發展雖然使得工業發展起來，但是跨國公司所賺取的利潤卻回歸母國，而對本地的進一步發展造成限制；另一方面由於對工資的壓制，使得本地消費能力並未增加，無法發展國內工業等問題。⁵⁵

卡多佐（Fernando H. Cardoso）不同意脫鉤論和停滯論，他認為發展和依附是並存的同時發生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相互矛盾的現象。第三世界在依附條件下還是能夠使經濟有一定程度成長的，這種發展有利於所有同國際資本有聯繫的階級，包括本地的農業、商業、金融和工業資產階級，甚至包括受雇於國際部門的工人階級，但是它不利於與跨國公司沒有聯繫的本國勢力。這種依附理論中的發展道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缺乏自主性技術而不得利用進口技術，收入分配相對集中化和相對貧困化，外債叢生、人力資源使用不當和備受剝削等。⁵⁶

⁵⁵ 王振寰、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五南圖書，1999年9月，頁653。

⁵⁶ Fernando H. Cardoso, *Associated, depend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他認為，國家在本國資產階級支持下抵制國際資本主義並根據國家自主路線推進發展的可能性並不實現。依附是由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發生作用的過程，國內的結構和政治因素比經濟因素和國外因素對於依附形式更具決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公司的利益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濟利益有可能協調和一致起來，形成「結合的依附的發展」，而中產階級和大部分工人階級都有可能從中受益。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發展中國家從「依附的發展」走向「獨立的發展」。卡多佐試圖把激進的依附論與溫和結構主義依附論各自的優點加以綜合和完善。他強調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依附關係來發展經濟，並應該對不同的依附性社會進行具體分析，從而提出不同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模式。⁵⁷

依附理論進一步擴大了邊陲國家發展的可能性，再不否認核心國家的影響和限制的同時，依附理論認為核心國家和邊陲國家之間不必是一種零和的衝突矛盾關係，而存有某種程度互惠的可能。同時，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性質，以及此一體系中核心國家和邊陲國家的互動關係，未必一成不變。此外，依附理論還指出，雖然所有的邊陲國家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束縛，可是由於每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和經濟規模等等條件並不相同，各國的歷史背景、階級結構、社會勢力的分合以及政府的作為也有差異，所以，彼此的依附情境並不見得都是一致的。⁵⁸

因此，依附發展理論的重要貢獻在於其指出了發展落後國家再對外依附條件下獲得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依附發展理論闡明了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參、世界體系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的視野比較開闊，它不侷限於國家層面，而是從整個世界體系來看問題，它的研究範圍不僅包括第三世界國家，而且還

pp.142-176.

⁵⁷ 王義祥，《發展社會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135-136。

⁵⁸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1993年6月，頁183。

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⁵⁹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從邊陲與核心的資源分配機制入手。「核心」係指已開發的工業化地區，「邊陲」指較貧窮並以出口原物料為主的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半邊陲」是一方面支配某些邊陲國，另一方面又被技術更先進的強國支配的國家。透過市場機制，邊陲受到中心的剝削。這是世界體系的空間劃分。⁶⁰

華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它有其邊界、結構、成員團體、合法性規則及凝聚性。它的生命由各種相衝突的力量構成，它們以張力聚合之，又隨著各團體試圖為己重塑這套體系而拆解之。它具有有機體的特徵，因為在其生命期中有些特徵在某些方面改變了，而在另一些方面則保持穩定。人們可以按照它功能的內在邏輯，定義其結構在不同時間的強或弱。」⁶¹

在世界體系之中的國家位置並非全然不變的，隨著自然條件、生產技術、以及國家政策等內外因素的改變，一個世紀裡的外部競爭場經常在下一個世紀變成邊陲或半邊陲地區。而核心國家可以變成半邊陲地區。半邊陲地區也可以變成邊陲地區（郭方等譯，1998a：523-524），⁶²也就是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國家是可以互相轉化、不斷變動的。

相較於現代化理論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具有以下特徵：（1）世界體系論擴大了社會發展分析的範圍。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論，實際只側重於對某些社會類型的發展問題分析。但世界體系論所考察的是世界整體的變遷與發展問題。從而可為人們認識整個世界的發展提供全面的分析視角。（2）世界體系論對依附論有明顯的發展。依附論只限於說明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狀況，並強調外因作用。但世界體系論著眼於整個世界體系的發展趨勢，且不只強調外因的作用，世界體系論是一種整體發展論。⁶³

⁵⁹ 王義祥，同註 55，頁 156-157。

⁶⁰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347-357.

⁶¹ 同前註。

⁶²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郭方、劉新成、張文剛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台北：桂冠，1998年2月。

⁶³ 徐新，《發展社會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330。

世界體系具有下列基本趨勢：1.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和勞動的商品化；2.固定資本的比例不斷上升，即機械化和技術化的趨勢；3.合同化，即越來越多的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是由正式的、精確的法律協定來決定，而不是由習俗來決定；4.勞動分工的專業化不斷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增大，世界貿易不再以「奢侈品」為主，而是以「必需品」或日常生活品為主；5.中心地區到邊緣地區兩極分化的程度越來越大。⁶⁴

世界體系理論可說是全球化理論的先聲，但作為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華勒斯坦對全球體系的形成與動力的解釋不無偏頗之處。他片面地強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建立在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世界體系的運作依附於勞動分工所造成的不等價交換，以致有人說這是一種「新史密斯式的馬克思主義」(Neo-Smithian Marxism)。⁶⁵

世界體系理論突破了依附理論中心與外圍兩極對立的狹隘框框，用一種動態的三維模式來考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興衰與變遷，提出了中心下降為半外圍、半外圍上升為中心的可能性，從而回答了依附理論不能自圓其說的東亞四小龍為什麼能夠在依附於資本主義中心的情況下取得迅速發展的問題。另外，世界體系理論視野比較開闊，它不侷限於國家層面，而是從整個世界體系來看問題，它的研究範圍不僅包括第三世界國家，而且還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⁶⁶

綜觀上述發展理論，存在著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三種理論均對社會發展道路與進程不夠重視，只強調發展結果。雖然現代化理論提出了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但對發展的過程很少論述；依附理論則僅僅致力於解釋導致第三世界國家不發達的原因，而未詳細說明中心—邊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世界體系論也未能

⁶⁴ 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頁168。

⁶⁵ 布萊納曾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以及斯威齊(P. Sweezy)的觀點，是「新史密斯式的馬克思主義」(R.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H. Alavi and T. Shanin ed.,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pp.54-71)，藉此反省長久以來在經濟學或是社會學中的一個領域—「經濟發展」。

⁶⁶ 王義祥，《發展社會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156-157。

說明世界體系何以形成和怎樣轉變為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結構的。

其次，變革與發展的力量和動力機制問題。任何社會中，變革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一是變革的意向性；二是變革的速度和程度易變性；三是變革的方式：和平的或暴力的、自覺的或自發的、持續的或斷續的。不同的發展方式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發展結果，如果單純像世界體系論那樣用結構決定論代替依附論的外部決定論都不會有所發展。發達和不發達均應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心理和價值觀等方面全面綜合考慮。

第三，發展模式和發展類型水平的多樣化問題。發展理論以現代—傳統、中心—邊緣的刻板劃分來概括無線多樣和複雜的世界發展狀況，顯然是不科學的，因此，需要構建一個多元的、廣泛而綜合的發展理論。

三大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國家的社會發展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價值，但同時也可發現三大發展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不發達的國家，所得出的結論與建議都過於抽象。因此，每個發展中國家在進行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必須把相關理論與該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國情結合起來，才可能真正地實現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社會主義國家同時進行國有體制和廣泛的社會福利，政府擁有絕大多數的生產工具，宣稱為整體社會的利益而經營事業。然而，他們的體制也開始變遷。⁶⁷高經濟成長、物價保持穩定、所得分配平均及人民生活品質提升是人們的共同訴求，中國大陸在中共的領政下，不和諧與相對滯後的發展使得其發展模式的變遷依此而生，產生了新的發展觀以因應需要。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下，中共之經濟政策應該因勢利導。過去，計畫經濟之實行凸顯大政府角色遭受多方批評。然而，適當之政

⁶⁷ Ma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等著，《政治學的世界（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台北市：時英出版社，2002年7月，頁54。

府角色裡，政府仍應適當地藉計畫經濟利導管控，朝向經濟發展之利基所在前進。而民間在經濟發展之過程裡，仍然較國家來的積極有活力，才是經濟發展之主要來源，是故政府管理之角色必須適當轉化，因應時代與新發展觀的要求。

「科學發展觀」的相關文獻之論述大致有三大主軸，包括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經驗教訓的成果；要求體制革新與轉變發展模式；強調「人本」，注重社會公平。茲彙整如下：

壹、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經驗教訓的成果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在《科學發展觀基本問題》⁶⁸一書中指出，科學發展觀是正確指導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是解決當前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全民協調、和諧穩定、又好又快、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方針。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深化了社會主義本質及其特徵的認識，拓寬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視野；深化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指導思想的認識，拓寬了對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視野；深化了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執政任務的認識，拓寬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視野。

科學發展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戰略方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又是科學發展觀要求實現的目標。科學發展觀是管總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定要依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新形勢新任務迫切要求領導幹部破除關於科學發展觀的片面理解，必須從政治、全局、意識型態、改革的、戰略的五個高度正確認識、科學理解和深刻把握科學發展觀。

⁶⁸ 王偉光，《科學發展觀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前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等人所編《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一書中指出：追求科學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命題，實現社會和諧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中共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和部署，為推進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指明了方向。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二者相輔相成，合則皆美，離則兩傷，這是人們在歷經了畸形發展所帶來的滯頓之苦和飽嘗了社會衝突所難免的失調之亂以後才悟出的道理和經驗。⁶⁹

中共中央黨校杜光教授在〈科學發展觀和不科學的發展觀〉⁷⁰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是對過去不科學的指導思想的否定，以科學發展觀取代不科學的發展觀，就是要扭轉社會畸形發展的趨勢，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但科學發展觀的一個不足之處，就是沒有把經濟政治的協調發展列入統籌兼顧之內。只重視經濟體制改革，不重視政治體制改革，只抓經濟市場化，不抓政治民主化，結果使中國的社會發展陷入了一個畸形的跛行的困境。

目前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幾乎都同政治體制的專制極權有關。以專制極權為主要特徵的現行政治體制，對內限制了社會的健康發展，對外損害了國家的聲譽。這是當前必須迅速扭轉的局面。作為科學發展觀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統籌經濟政治的發展刻不容緩。應當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有步驟地改革政治體制，肅清專制主義，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否則就很難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統籌兼顧」、「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在〈對科學發展的九點思考〉⁷¹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發展的水準使其有條件解決過去想解決而解決不了的問題。許多社會發展問

⁶⁹ 吳樹青、趙存生主編，《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頁371。

⁷⁰ 杜光，〈科學發展觀和不科學的發展觀〉，「天益網」，2004年7月25日，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7171>>。

⁷¹ 樊綱，〈對科學發展的九點思考〉，此文為樊綱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的發言，載於《解放日報》，2008年6月10日。

題，如科技進步、教育發展、環境治理、生態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過去在溫飽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的時候，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給，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難顧及到。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已基本實現了小康，國家的財力和經濟實力有了明顯增長，人均 GDP 已經達到 1,000 美元。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水準，其有條件、也有能力設法解決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事情。

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發展要符合經濟規律，發展能夠反映客觀條件和社會需求的各種變化。不符合經濟規律，最後都會導致不發展。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發展意味著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我們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所以要以發達國家的水準作為標竿。他們人均 GDP 達 4 萬美元，將來會達到 5 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跟他們一樣的速度，要發展得快一點。他們不斷有新技術出現，還在不斷創新，我們速度慢一點就永遠趕不上。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榮開明在〈論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⁷²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和以往不科學的發展觀的區別在於：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推動改革和發展。它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根本內涵和根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質是要實現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它的提出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成功經驗的總結，又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形成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系統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山西財經大學商務學院王効民教授在〈正確處理社會矛盾，努力實現社會和諧〉⁷³一文中指出，對於社會主義而言，實現社會和諧的基本方法是改革。改革通常是自上而下發動的特殊社會活動，改革的

⁷² 榮開明，〈論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鄂州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5 期，2006 年 9 月，頁 5。

⁷³ 王効民，〈正確處理社會矛盾，努力實現社會和諧〉，收錄於吳樹青、趙存生主編，《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150。

基本目的是「補天」。因此，改革者必須在兩難境況中選擇發展道路：既要變革，又要防止變革失控。由此必可以推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自覺調節社會關係、正確處理社會矛盾，使社會總體遠離危機狀態，最終達到社會和諧。

貳、科學發展觀要求體制革新與轉變發展模式

2003 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引領中國經濟的發展，要加速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改變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⁷⁴此觀點幾乎是中國大陸學者一致的看法。其中，吳敬璉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困難與出路〉一文中表示，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它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⁷⁵因此，體制革新成了改善當前中國大陸發展問題的主要課題。

中共中央黨校段培君教授在〈中國發展新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實踐解讀〉⁷⁶一文中指出：中國發展的新模式，體現為中國發展的新理念、新原則、新的目標體系、新的發展方式和新的發展戰略。自 2003 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到確定「十一五」規劃並圍繞這一規劃展開全面實踐，中國發展的新模式已初步形成。其認為：一、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發展新模式的基本內核；二、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化形式是中國發展的新模式；三、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展開形式是中國發展的新模式。中國發展的新模式仍在發展之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不斷完善和發展。

段教授又另在〈科學發展觀與中國發展的新模式〉⁷⁷一文中表示：中國發展新模式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展開和具體體現。中國發展新模式以國內外「四個轉變」為現實依據，以新的核心理念、建

⁷⁴ 郭鴻悉，〈中國城鄉發展動力結構調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視角的分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頁 109。

⁷⁵ 吳敬璉，〈中國經濟轉型的困難與出路〉，「中國評論新聞」，2008 年 2 月 6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6/3/8/10056385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63851>>。

⁷⁶ 段培君，〈中國發展新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實踐解讀〉，《前線》，2006 年 9 月號（總 135 期），頁 21-23。

⁷⁷ 段培君，〈科學發展觀與中國發展的新模式〉，《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13-17。

構原則、目標體系、運作機制和重點指向為主要特徵。中國發展新模式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深入發展：在目標體系方面，有必要將環境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佈局；在運作機制方面，有必要提出「統籌經濟與政治發展」、「統籌經濟與文化發展」；在戰略組合方面，有必要以「實現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替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研究員宋國誠在〈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⁷⁸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是在分析世界各國發展趨勢和總結中國改革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馬克思人類發展第三（最高）階段的嚮往與追求。它總體上涉及「思想觀念／經濟體制／政府模式」的轉型。它包括經濟增長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發展，包括人的主體從「經濟人」向「自由人」的發展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上從消耗性發展到可持續性發展，也包括政治體制上從威權統治到公共治理、從統制型政府到參與服務型政府的發展。其認為科學發展觀是一種「人文／經濟／民主」的對接與融合，是跨越單純物質意義的經濟增長，走向人文意義的社會綜合發展，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趙建民教授在〈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⁷⁹一文中表示：目前中國大陸正面臨典範轉移，共產黨所賴以統治的合法性出現危機，必須有所改變。局部先富的發展策略，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現在又到了另一典範轉移的時候了，這就是所謂「科學發展觀」的意思。

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⁸⁰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代價過大。自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確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方針以來，雖然已在這方面取得不少成效，但總體上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更加

⁷⁸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97-134。

⁷⁹ 趙建民，〈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12 期，頁 43-46。

⁸⁰ 馬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收錄於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編寫組，《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127-138。

突出，資源環境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不僅影響短期的健康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將嚴重制約長期的持續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順利實現。

中共十七大在全面把握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從當前的發展實際出發，將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兩個字的改動，寓意深遠，意義重大，針對性和指導性更強，反映了中共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全面、更深刻。用「發展方式」替代「增長方式」事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于連坤教授在《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⁸¹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在發展觀上逐步實現了三個大的轉變：從追求「增長第一」的經濟發展，轉變為注重經濟社會的綜合協調發展；從追求以物為中心的發展，轉變為突出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從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轉變為重視人與自然統一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主要是：經濟發展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但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異常突出；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效日趨顯著，但成長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改革攻關的任務還相當艱鉅複雜；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民主政治建設不斷發展，但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也明顯增強等等。這就決定了解決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共中央才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

安徽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汪曙光教授在〈世界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化—兼論科學發展觀對現代化模式的超越〉⁸²一文中表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總體性和中國現代化發生機制的特殊性，使得中國現代化自啟動以來，就處於兩難困境之中。在世界一體化加速發展的

⁸¹ 于連坤主編，《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

⁸² 汪曙光，〈世界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化—兼論科學發展觀對現代化模式的超越〉，《特區經濟》，2006年第3期，頁20-22。

今天，這一困境又表現為共時態存在的三對矛盾：先發與後發；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世界「一體化」與民族化。要走出困境，就必須具備世界視野，實現中國現代化模式的「超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模式的轉換和超越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實踐可能。

這一發展觀反映在現代化模式上，就是在發展目標上注重單一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轉向重視多目標的、綜合的、全面的發展；在發展的價值選擇上，由注重物的價值轉向以注重人的價值為中心；在發展的內容上，由注重財富的增加，轉向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浙江省科學發展觀與浙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郭祥才在〈從後發現代化看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又好又快」的可行性探析〉⁸³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不僅要反映出它的發展目標，還必須反映出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而且作為後現代化國家這種精神實質還必須反映出後發型的特性，聯繫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可以概括為：發揮後優勢，堅持跨越式發展，走新型現代化之路，實現「又好又快」地發展。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王忠武教授在〈科學發展觀與發展模式創新〉⁸⁴一文中表示：發展模式是人為了實現發展目標而選擇和實行的方式、方法與道路的統一體，它是由主體、客體、目標等要素組成的完整系統，對於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均具有重大決定性影響。發展模式是人按照一定的發展觀念建構的，不同的發展觀念會產生不同的發展模式及其發展效果。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對現有發展模式進行系統創新。

中共遼寧省委黨校宗河教授與中共黑山縣委黨校常麗豔教授在〈科學發展觀的實質是構建良性循環的發展模式〉⁸⁵一文中表示：當前中國和整個人類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都面臨尖銳矛盾，傳統的發展模

⁸³ 郭祥才，〈從後發現代化看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又好又快」的可行性探析〉，《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2007年7月，頁38-42。

⁸⁴ 王忠武，〈科學發展觀與發展模式創新〉，《泰山學院學報》，第27卷第1期，2005年1月，頁74-78。

⁸⁵ 宗河與常麗豔，〈科學發展觀的實質是構建良性循環的發展模式〉，《黨政幹部學刊》，2005年第11期，頁30-31。

式已經走到盡頭，構建新發展模式是必然的選擇。科學發展觀的落腳點是構建良性循環的發展模式，以促進生產力的健康發展。

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李曉南在〈科學發展觀與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⁸⁶一文中指出：落實科學發展觀重在破解發展難題。科學發展觀是「多樣性統一」的具體概念(有機整體)。它由這樣幾個相互關聯的基本環節：發展的核心理念(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以及這個核心理念的現實指向(破解何種發展難題)→核心理念指導下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的選擇→發展戰略目標的制定及其佈局→發展機制(體制、操作手段、可資借的資源、公共政策和考核體系)→對實踐的影響。「繼續下大氣力抓好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的途徑之一是從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具體化入手。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劉毅強教授在〈試論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創新〉⁸⁷一文中表示：創新發展模式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對中國發展模式做出了全面的創新。科學發展觀破解了中國發展模式難題，開創性地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创新型國家、建設節約型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等一系列重大舉措。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創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既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拓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又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勇擔責任的大國形象以及中國道路的獨特魅力。

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時岩博士在〈科學發展觀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中的效力分析〉⁸⁸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遵循的指導方針。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建立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該文主要借助經濟學原理，探討科學發展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用機理，並對科學發展觀在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向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的效力進行分析。

⁸⁶ 李曉南，〈科學發展觀與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第9卷第1期，頁52-55。

⁸⁷ 劉毅強，〈試論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創新〉，《求實》，2008年第5期，頁12-14。

⁸⁸ 時岩，〈科學發展觀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中的效力分析〉，《寧夏社會科學》，第2期（總第147期），2008年3月，頁43-45。

參、科學發展觀強調「人本」，注重社會公平正義

胡鞍鋼認為，中共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和發展戰略不同於 1978 年中共提出的發展觀。新發展觀針對過去二十多年經濟迅速發展出現的相關的社會代價、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等問題，充分注意到中國進入社會矛盾凸顯期，明確提出避免中國陷入壞的發展可能性，爭取可持續的好的發展可能性。從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中國政府就開始主動、適時地調整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形成了基本上適合中國國情的、針對現實挑戰的、與國際千年發展目標和發展理念相吻合的發展新戰略。這是旨在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減少貧困，促進人類發展和社會發展，滿足十多億人口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這包括首先滿足全體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諸如溫飽、就業、教育、衛生等；進而使他們不斷達到較高的人類發展水平，享受較高的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⁸⁹表示胡鞍鋼基本上將科學發展觀視為中共轉向注重「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的轉折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陸學藝教授在《中國社會發展報告》一書中認為：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社會改革的步伐也要跟上去，特別是要搞好城鄉管理機制的改革，住房體制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待業保險制度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組織人事制度改革，工資制度人事改革等等。如果沒有社會改革的配套，經濟改革也難以深入下去。⁹⁰實際上就是在強調改革不僅是經濟的增長，還必須有社會保障等措施的配合才能相輔相成。

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逢錦聚教授主編的《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⁹¹一書中指出：中國正在發展的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正在建設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由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國情決定，一方面中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另一方面，中國一定要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改革創新，走具有中國特

⁸⁹ 胡鞍鋼，《中國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280-281。

⁹⁰ 陸學藝、李培林，《中國社會發展報告》，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4。

⁹¹ 逢錦聚主編，《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年 7 月。

色的道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因而形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

該書同時指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取得成績的同時，經濟與社會發展也面臨一些突出問題：資源、能源、人口的制約日益突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迫切；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縮小發展差距和協調發展的任務艱鉅；社會利益關係趨於複雜，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縮小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難度加大；勞動者就業結構和方式不斷變化，社會組織和管理面臨新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其經濟社會就能夠繼續順利發展；如果處理不好，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制約，甚至可能出現停滯。

進行體制轉型是為了實現發展，發展的最終目標絕不是簡單地實現經濟總量增長，而是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且，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本身也需要以和諧社會為基礎，以和諧為條件。沒有一個和諧的環境，就沒有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再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能最終轉化為社會進步。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馬列部吳文新教授在〈科學發展觀：科學人本模式的主導觀念〉⁹²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在實踐上是一種可稱作「科學人本模式」的社會整體發展模式，它是對傳統的「科學物本模式」的揚棄。科學人本模式以人性科技為手段，以人本文明為目標，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具有現實的必然性，而科學發展觀正是科學人本模式的主導觀念。

河南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執筆侯遠長在〈科學發展觀的三個創新〉⁹³一文中提及，第一次提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這一思想，是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講話」中，針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奮鬥目標而強調的。《講話》把「三好」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相聯繫，不能不說是一種思想創新。從黨的宗旨到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和落腳點，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發展創新了黨的宗旨觀。科學發展觀這一立足點

⁹² 吳文新，〈科學發展觀：科學人本模式的主導觀念〉，《探求》，2004年第5期，頁17-21。

⁹³ 侯遠長，〈科學發展觀的三個創新〉，《河南日報》，2007年8月17日。

和落腳點，要求我們做好「四件事」，分「三步走」。即做好多數人受益的事、做好群眾最急需的事、做好長遠起作用的事、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三步走」，即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要實現好，人民群眾的近期利益要維護好，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要發展好。

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研究員、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包心鑒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的重大創新——論科學發展觀〉⁹⁴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深刻揭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本質、狀態與目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理論探索的集成創新。科學發展觀深刻回答了「為誰發展、靠誰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科學發展觀深刻指明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把堅持以人為本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始終。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呈現擴大趨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部分官員腐敗以及政府公共財政體制不當，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政府在發展模式上盲目鼓勵做大做強，忽視甚至歧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導致深層次的收入差距拉大，造成越來越多的因失業和就業不足而貧困的人口。中國要實現科學發展，實現構建和諧社會，推動社會公平的目標，關鍵是要實現發展模式的公平。⁹⁵

徐鴻武在〈科學發展觀與當代社會發展理論〉⁹⁶一文中表示：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就是為了切實有效解決人民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普遍幸福。科學發展觀充分體現著社會公正理論，它的提出就是為了有效解決社會的不公正現象。在繼續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下，應更多些向公平方向傾斜。例如縮小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必將有利於實現社會資源的人人共用，普遍受益和共同富裕的

⁹⁴ 包心鑒，〈中國現代化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的重大創新——論科學發展觀〉，《山東警察學院學報》，總第 85 期，2006 年 1 月，頁 5-9。

⁹⁵ 〈十七大臨近 黨校學者籲實現發展模式公平〉，「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5 月 29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7/7/3/10037739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377392>>。

⁹⁶ 徐鴻武，〈科學發展觀與當代社會發展理論〉，原載於《光明日報》，2004 年 10 月 19 日，「馬克思主義研究網」，2008 年 9 月 27 日檢索，<<http://myy.cass.cn/file/20051122144.html>>。

社會發展宗旨，必將有利於激發社會的活力，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潛在能力，推動社會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了社會不和諧、造成了社會不穩定，發展模式的轉化是為了破除積弊、解決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建立正是為了嘗試解決這些問題，突出了第一要義是發展，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概念，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精神內涵，成為中共執政最高指導原則的戰略方針。

第三節 全球化與發展模式的轉化

全球化浪潮席捲全世界，許多政策問題的探索不得不將其納入討論的範疇。儘管人們對於全球化莫衷一是，但是視之為一客觀的發展趨勢是較為無異議的陳述，其基本特徵是生產要素跨國界的自由流動與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分配。

對於眾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參與全球化的水平高低和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推動本國工業化與現代化加速發展並進而縮短對發達國家經濟追趕歷程的重要制約因素。

第一，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的落後性（economic backwardness）要求它們必須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以盡快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和民眾的生活及福利水平。而作為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後發國」（later comer），發展中國家實現上述目標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和先進工業化國家當年所處的環境與條件已大不相同。因此，為了克服不利的後發障礙，有意識地選擇以高增長帶動的追趕型發展戰略就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重要特徵。

第二，由於國內資源條件和自身發展階段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單純依靠內部資源和市場無法完全滿足高速經濟增長的要求，因此，為了維持高經濟增長，就必須按照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則通過參與全球市場而更多的利用國外資源，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全球化的進程也就是各國不斷擴大參與國際分工、實現資源最佳

配置的動態調整過程。

第三，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由於增長型態和增長質量的不同會導致過程中的不平衡性，其中包括地區性不平衡及不同成員之間的群體性不平衡。不平衡的實質是增長過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協調問題；亦即不同社會群體和不同區域能否公平地分享經濟所帶來的收益（World Bank, 1999）。

第四，不平衡性的日益累積將會導致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衝突和不穩定性，它將危及到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全球化進程的發展。而且，全球化本身的發展（特別是貿易自由和投資化的發展）就會和社會穩定之間產生一些衝突（Rodrik, 1997）。這至少表現在以下三方面：（1）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能夠直接或間接跨境流動的社會群體與那些不能跨境流動的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2）全球化導致的國與國之間的社會規範及制度之間的衝突；（3）全球化對政府的一些穩定社會的功能提出挑戰。⁹⁷

中國大陸以具有比較優勢的要素參與全球化，就像從一個很窄的通道與外界保持溝通，這個通道的典型代表是「中國製造」、出口加工業，以及引進外資。中國大陸在變，世界也在變。當全球化達到一定程度時，開放經濟成為參與全球化的一種必然趨勢，這時候中國大陸的開放就不能再停留在一個窄小的「胡同」裡了。

今天民族國家內的勞動市場在全球化的因素下被切割成兩個團體，一個是與全球市場相關的工作，另一個是與全球市場無關的工作。前者由於居於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鏈中具有高附加價值的一環而使得其薪資水準不斷上升，而後者則或者只是占據較低附加價值部分，或者根本完全被排除在全球市場之外而成了全球化下的輸家，其結果是所謂的社會兩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現象。⁹⁸中國大陸的制度與現狀大致符合此現象的闡述，沿海城市居民不斷提升生活水準，內陸農村居民的生活水準相對滯後。

⁹⁷ 胡鞍鋼主編，《全球化挑戰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頁17-18。

⁹⁸ 呂建德，〈全球化與社會不平等〉，收錄於張世雄，《社會正義與全球化：福利與自由主義的反思》，台北：桂冠圖書，2004年9月，頁193。

目前多數的經濟發展仰賴全球化的運作模式，但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兩個方面的社會後果：一是導致國內社會不平等加劇以及貧困（主要是相對貧困）問題增多，從而導致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增大；二是削弱了政府維持和提高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給付的動機，從而使社會成員、尤其是下層成員獲得的保障和福利水準相對降低，進而使相對貧困問題長期難以解決。⁹⁹

全球化藉由競爭的壓力威脅社會秩序，而更彈性的勞動市場也引發不安全感。所得不均增加和較高的失業撕裂社會連結。當工作、居住，與性別關係轉變時，全球化使傳統家庭和社會結構及關係面臨緊張。政府增加稅收或增加社會安全給付能力的限制，壓抑政府有創意地回應這些議題的能力。國家政府看似無能解決，或改善這些問題，又導致對政府支持或重建社會的行動能耐的信心薄弱。最後，在競爭性的政府中，不具生產力被視為負擔，且提供服務給他們也被認為是對國家競爭力的一種威脅，如此便會弱化集體責任的共識。¹⁰⁰

長江商學院的創辦院長項兵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不僅僅是脫離貧困，中國大陸靠低成本參與全球競爭，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成本沒有考慮，首先是對環境的保護，要達到歐洲標準不是 15,000 億美元外匯儲備能解決的；第二是醫療衛生成本、退休成本都沒有考慮，通用汽車一輛車的價格光工人退休成本就佔了很多，所以廉價的商品是通過犧牲環境、醫療衛生、退休金來取得的。¹⁰¹ 忽視各類成本讓中國大陸現今的發展陷入困局。

中國大陸在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也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挑戰，例如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業壓力突出、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的能源和環境壓力不斷增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¹⁰² 為了融入於全球化的行列之內，這些矛盾與問

⁹⁹ 關信平，〈全球化北京中的中國社會政策〉，收錄於唐鈞主編，《社會政策：國際經驗與國內實踐》，北京：華夏，2001 年。

¹⁰⁰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66。

¹⁰¹ 項兵，〈中國企業需以全球化應對全球化〉，《第一財經日報》，2007 年 12 月 19 日，參見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23&fi=NEWSBASE\20071219\WEB941&vi=32365&sdt=20071217&edt=20071219&top=50&date=20071219&time=11:36:24&cls=index15_totalnews>。

¹⁰² 謝旭人，〈調整宏觀政策應對全球化挑戰〉，《證券時報》，2007 年 12 月 13 日，參見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19&fi=NEWSBASE\20071213\WEB830&vi=31987&sdt>>。

題也隨之強勢湧現。

為了適應全球化，中國大陸不得不進行痛苦的調整。國企員工已經從 1995 年末的 1.1 億，下降到 2005 年 3 月的 6,600 萬。那些簡單地認為製造業工作從美國轉移到了中國大陸的人會驚奇地發現，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工作已經從 1994 年的 5,400 萬減少到了現在的不滿 3,000 萬。即使是這些驚人的數字都不足以反映中國大陸由於激烈的競爭和後來加入 WTO 所經歷的痛苦和調整。¹⁰³ 因為發展受全球化衝擊的緣故，轉化發展模式是中共不得不的選擇。

儘管改革開放後，農民被允許外出就業，比改革前有了明顯的進步，但是他們在制度上並沒有獲得過公平的合理對待，身份的標誌並未從他們身上泯除，他們的社會地位依舊低落，向上流動的機會也非常地渺小，進城的農民工就是顯著的例子。

全球化所導致的產業結構調整將使大量的富於勞動力從農業中脫離出來，非市場的社會或文化排斥的減緩或消除將減少他們向城市流動的障礙，這將對原來因受到城鄉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保護而不至於陷入貧困的城市脆弱群體造成巨大的衝擊，結果是有更多的城市職工在與進城務工的農民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而失業或下崗，而一旦失業或下崗就不太容易重新獲得工作崗位，從而陷入貧困之中。¹⁰⁴

也就是說，全球化對中國大陸企業與產業的影響在於勞動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使其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大幅增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但由於中國大陸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競爭力並不具有優勢，即可能遭受外國進口產品的強烈衝擊，阻礙的經濟成長，進而引發失業問題。

另外，由於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其商品充斥世界，那麼，西方的消費者就可以在地球的另一邊，通過對商品的選擇，影響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西方購買者，對商

=20071211&edt=20071213&top=50&date=20071213&time=11:15:10&cls=index15_totalnews>。

¹⁰³ 威廉·奧弗霍爾(William H. Overholt)，〈中國與全球化〉，收錄於本力主編，《崛起？！中國未來 10 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303。

¹⁰⁴ 程勝利，《經濟全球化與當代中國城市貧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 年 7 月，頁 94。

品生產國的工作條件提出要求。¹⁰⁵不過，這些要求實際上未被資產階級真正重視。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全球化對中國大陸在下述方面的負面影響將越來越突出：(1) 結構性失業人數增加，傳統部門淘汰的失業人口將很難在新興部門就業；(2) 加劇地區發展差距，東西部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3) 貧富差距的擴大，農村貧困問題將會加劇，城鎮貧困問題日益嚴重；(4) 加重對環境和資源的負擔，導致生態環境惡化；(5) 外部衝擊對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

因此，全球化下不同群體和不同地區的利益得失並不平衡。得益較少或利益受損的群體主要是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和國企工人，得益較少或利益受損的地區主要是開放度較低的中西部。若不能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由此造成的人類不安全問題，將勢必削弱政權的社會基礎，影響政治穩定，使改革開放遭遇空前的社會阻力。

市場的作用是增進效率，建立資源的轉移機制；政府的作用是增進公平，建立利益的轉移機制。完善的利益轉移機制和補償機制可以使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決策者應當以「富民」為宗旨，在繼續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的同時，配套實施宏觀經濟穩定、反貧困、就業、地區平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從而在更好地抓住全球化所帶來的空前發展機遇的同時，積極克服其負面效應，¹⁰⁶才得以讓發展持續推進。

¹⁰⁵ 〈一位瑞典專家談中國和全球化〉，原載於香港《爭鳴》雜誌 2007 年 11 月號，「多維新聞網」，2007 年 12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MainNews/Opinion/2007_12_12_1_26_17_424.html>。

¹⁰⁶ 吳劍平與吳群剛，〈全球化與中國新的發展模式〉，收錄於俞可平主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年 5 月，頁 123-124。

